

“大仇斯复”的背后：《斯巴达之魂》文本生成考论

朱崇科，周楷棋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广东珠海，519082)

摘要：鲁迅从作为晚清政治话语的复仇出发，以希波战争这一经典的“复仇范本”为母题，又在既有材源的基础上有侧重地突出彰显民族复仇色彩的战役节点，使《斯巴达之魂》不仅呼应拒俄运动，更暗含政治革命的意图，反映了近代大小两类民族主义思潮相互纠缠的现象。该文对“斯巴达”题材的选择与浙江的地域文化传统，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探索过程中，与一度被视为近代国家建设典范的“斯巴达”产生精神共鸣有关。鲁迅基于史实对埃烈娜殉身谏夫这段关键情节的建构，与晚清“女国母”“女丈夫”等文学思潮的同频影响有关，从文学层面丰富了复仇的表达。此外，《斯巴达之魂》直到1935年才被重新收编入集，暗示着鲁迅对往昔复仇精神的历时追寻。

关键词：鲁迅；斯巴达之魂；复仇；材源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4)04-0182-10

《斯巴达之魂》是鲁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出发，解读爱国、尚武、革命等显要特征。《斯巴达之魂》还是鲁迅复仇话语的初声，其在前言部分介绍希腊战胜波斯时使用的“大仇斯复”一语，是鲁迅最早的复仇言说，文中亚里士多德侥幸生还后又以死雪耻的情节，也是复仇主题的彰显。不难发现，《斯巴达之魂》的复仇话语虽渊源自晚清末年的革命思潮，但目前少有研究就此深入，辨析鲁迅对复仇话语的承接路径。虽然根据鲁迅自述，“报仇雪耻”的绍兴传统仿佛是复仇精神最重要的来源，但彼时身处革命场域的他不可能不对这一政治性的话语身有所感。以这一事实为前提，鲁迅对《斯巴达之魂》的长期“忽视”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上述是既往的相关研究较少注意或讨论的方面。

本文旨在从《斯巴达之魂》的题材选典、复仇精神的跨文化共鸣以及埃烈娜形象的建构思路三个问题出发，探讨复仇话语如何在文化实践

的过程中影响《斯巴达之魂》的生成，以及作为言说主体的鲁迅，如何在创作过程中展示出对复仇话语的主观把握。“复仇”是鲁迅一生的文学命题，作为“初声”的《斯巴达之魂》不仅揭示了文本的话语之源，亦为后续的言说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本文还将讨论《斯巴达之魂》在鲁迅自我言说中的“阶段性缺席”现象，探析文章因鲁迅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复仇的认识嬗变而被重新收编入集的可能原因。

一、选典：作为民族复仇话语范本的希波战争

1903年，鲁迅应许寿裳之邀，为响应留学生界如火如荼的拒俄运动而作《斯巴达之魂》。中井政喜指出，该文选择书写普拉提亚战役史实的目的还包含着对当时被视为异族的清王朝的复仇意识，但并未深入论述^[1]。《斯巴达之魂》的成

收稿日期：2024-03-14；修回日期：2024-05-20

作者简介：朱崇科，男，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周楷棋，男，广西南宁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联系邮箱：385873899@qq.com

文无疑与时事息息相关，但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出发，也应看到复仇主题形成背后各种复杂、交错的话语机制及造成影响的权力实践。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成为各个被压迫的民族争取解放和平等的思想武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并迅速兴盛，成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潮之一，作为一种革命话语深刻影响了民族主义革命的进程。清末，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外患”和清王朝腐败统治及对外妥协的“内忧”共同作用下兴起的革命运动，以章太炎鼓吹的“排满复仇”为主潮之余也深受民族主义话语的影响，从日后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思想中即可见一斑。有论者指出，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大致以反满革命为中心的种族主义运动，以及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国民主义、以对抗世界帝国主义为中心的爱国主义运动两股思潮为主流^[2]；1903年，拒法、拒俄运动相继兴起，受到两股思潮交错影响的留学生界，成为鲁迅创作《斯巴达之魂》的话语场域。

民族主义思想与复仇话语的内在联系，以及其在历史文本和事件中的话语传递，是鲁迅选择《斯巴达之魂》题材的潜在原因。作为远古时期族群认同的现代表达^[3]，民族主义的认同意识与复仇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吉尔·德拉诺瓦认为，民族主义表现为对现实的反抗愿望，目的是赋予民族以更大的重要性和应有的价值^[4]。民族认同在反抗侵略、希求解放的民族内部可能会转化成强烈排外的民族复仇主义，比如鲁迅日后在《摩罗诗力说》中论述密茨凯维支等诗人时涉及的，近代波兰以“复仇—复国”为创作范式的文学传统。鲁迅对《斯巴达之魂》主题的选择也颇见匠心，希波战争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反侵略战争，对这场战争的论述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复仇的烙印，相关的具体记载最早大致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复仇是作者叙事的心理线索之一，贯穿希波战争，尤其是在薛西斯一世主导的第二阶段前后。已有学者指出，“挑衅—报复”是希罗多德解释希波战争发生原因的模式^[5]。具体来说，希腊与波斯的具

体矛盾最早就是由双方一系列的相互挑衅和报复引起的^[6]，后来，薛西斯一世发动第二阶段战争的行为背后也包含着为其父大流士一世在第一阶段战败的结局进行复仇的动因^{[7](89)}。在战争过程中，从温泉关战役到普拉提亚战役也拥有两条复仇的线索，分别是希腊人(尤其是斯巴达人)从集体角度报了温泉关战役的一箭之仇：“波斯人因杀死列奥尼达而对斯巴达人所欠下的血债，终于由玛尔多纽斯来予以偿还了”^{[7](854)}；温泉关战役的生还者阿里斯托德姆斯(鲁迅译：亚里士多德，下同)通过浴血奋战洗刷个体的耻辱：“在普拉提亚战役中，阿里斯托德姆斯洗雪了他所蒙受的一切羞辱”^{[7](747)}。作为希波战争最早的“原文本”，《历史》主要从希腊一方的视角出发，强调战争的反侵略性质以及对波斯的复仇 意识。

在民族主义思潮兴盛的近代东亚，希波战争常被视为宣传反侵略战争的范本，即以希腊的胜利反抗宣扬团结勇敢的战斗精神，许多介绍该场战争的论著在论述时都延续着复仇的话语基调。樽本照雄指出，鲁迅留日时《历史》尚无完整译本，应有复数的材源典据^[8]，在后来被考辨为可能是《斯巴达之魂》共同材源的一批晚清和日本明治时期的西学书籍中^[9]，对希波战争的论述即包含复仇的线索。比如，徐继畲编著出版于1848年的《瀛环志略》，就将薛西斯一世发动第二阶段战争的心理动因总结为“誓雪仇耻”^{[10](489)}，日本的冈本坚辅借鉴此书编纂而成的《万国史记》也延续了这种说法。再如，桑原启一编译发行于1893年的《新编希腊历史》^[11]，以及1896年涩江保著的《希腊波斯战史》^[12]，论述希波战争时都涉及了斯巴达人报温泉关之仇，以及亚里士多德个人雪耻这两条复仇线索。这类材源延续了《历史》的叙事情感和复仇基调，其出现主要也与近代东亚，尤其日本的文化背景有关。因明治维新而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日本一度深受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需求下，这类强调民族意识和复仇情绪的历史典故，既是日本文化界的一时之选，也可能使当时受革命思想影响的鲁迅有所感应。

当然，从文章来看，鲁迅无疑是从谋求中国

自强独立的角度把握了史事。据许寿裳言，鲁迅由应约到交稿不过短短两日时间，相比“抱佛脚”的撒网求鱼，《斯巴达之魂》从主题到材料很大程度上都更可能来自鲁迅往时阅读的知识积累。受到时局感召的他可能回顾过往的阅读经验，从中选择彰显民族复仇精神的希波战争作为《斯巴达之魂》的主题，展开对复仇的最初言说。必须强调的是，目前学界尚未发现《斯巴达之魂》的直接材源。主流观点为，《斯巴达之魂》是鲁迅通过中日的各类材源“编译”或依托基本史实创作而得。从作为主题的希波战争和作为话语线索的复仇来说，其从遥远的古代世界历史到近代中国的革命语境，以及鲁迅基于地域文化渊源而与复仇产生的深层共鸣，都可能成为影响他选择撰写希波战争题材的内在原因。

1903年4月，拒俄运动爆发。5月中旬，《浙江潮》第4期刊登《留学生记事》(下称《记事》)，其中部分内容是留学生群体上书政府官员的“谏文”，其中向北洋大臣袁世凯的致信中的这段话，被普遍认为是《斯巴达之魂》的直接“前文本”：

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卒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13][135]}

从时间上说，这段前文本的出现时间确实与《斯巴达之魂》距离最近，但《斯巴达之魂》的话语立场实际上和《记事》存在区别，鲁迅对文章主题的选择或许与《记事》有关，但他对待材源的态度则截然不同。《记事》提及温泉关战役的原因，在于留学生群体在拒俄运动中的自我体认与斯巴达高度一致。文中，有留学生在组织抗俄义勇队的会议上诘问“安知政府之必能主战，以学生之力，何能担当此任”时，大会主持回答“政府主战与否，固非我辈所敢妄决”，且“至云学生无用，诚哉无用”，但只求“徒以国家大义所以激誓，以身殉为火炮之引线，能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中国去吾辈数人，如九牛一毛，我国民有知，亦当为止涕泣”^{[13][132]}。留学生们自认为是拒俄先驱，甚至不惜组织义勇队、学生军

等民间团体投入斗争，其行为蕴含的精神与斯巴达在希波战争第二阶段初期作为希腊诸邦的先军，率先抵抗波斯入侵这一史实类似。被符杰祥指出是《斯巴达之魂》“中国知源”之一的《希腊志略》，认为温泉关战役“能使希腊诸国人民，举知报国尽忠为何如事耳”^[14]。当时，斯巴达作为抵御波斯入侵希腊本土的先锋，虽然在温泉关战败，但成功拖延了波斯的侵略速度，并点燃了半岛诸邦的反抗精神，某种意义上也为雅典的防御提供了更多的准备时间和作战参考经验，这才有了后来萨拉米海战与普拉提亚战役的反败为胜，这段历史无疑能被视为激发爱国精神的良范。而留学生上书的目的在于鼓动清王朝拒俄，意味着与其站在同一立场，关于温泉关战役的文本则展现出以斯巴达、希腊和波斯分别对应留学生群体、清王朝和沙俄的话语建构。有论者指出，当时诸如东京或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或者拒俄运动中产生的爱国团体，都还不能称为反清革命团体，会员们甚至曾试图求得清王朝的支持^[15]。作为趋势的反清浪潮是逐步推进汹涌起来的，其中也会有一个相对摇摆和波动的阶段，《记事》就是这种暧昧语境下的产物。

所以，《记事》是从反帝的民族主义情感出发，就拒俄运动和拒法运动劝谏清廷表态的上书，作者的立场并非排满。该文后半部分的“拒法运动”还提到对民众因仇外而起的，所谓“其祸倍烈”的报复行为的担忧^{[13][130]}。这种提防、敌视民间复仇的态度是对中国历朝官方“法禁复仇”话语的延续^{[16][168]}。同时，《记事》只提及了凸显爱国和反抗精神的温泉关战役，却未提及决定战果且体现复仇精神的普拉提亚战役，可能也是从照应官方立场的角度出发对复仇话语的回避，毕竟在晚清民族革命思潮的语境中，复仇即代表对清王朝的反抗和颠覆。

而深受革命思潮影响的鲁迅即在《斯巴达之魂》中提到了普拉提亚战役的报仇雪恨：

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伦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敌由间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兵气萧森，鬼雄昼啸，迨浦累皆之役，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懔

慷慨有生气也。^{[17](9)}

作为基于民族意识的反侵略精神表达，复仇话语在近代中国甚嚣尘上的原因首先在于晚清末年革命运动的兴盛，所以《斯巴达之魂》的“大仇斯复”不仅具有反帝的意指，更潜在地指向鲁迅所热衷的革命活动，也潜在颠覆了《记事》的话语立场。在革命氛围浓郁的日本留学生界，鲁迅参与了1902年弘文学院因反对清王朝而起的停课风波以及各类宣传革命的活动之中；同年11月，浙江同乡会成立，他和许寿裳等名列其中。

《斯巴达之魂》写作的具体时间是1903年5月底到7月初，章太炎的《驳康有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这两篇革命檄文也发表于其时，在高涨的革命情绪与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浪潮交汇之下编译成文的《斯巴达之魂》可能自然地掺杂着这两种最迫切的现实立意。拒俄运动兴起后，清王朝以“严密防范、坚决弹压”的政策坚决打压以留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作为运动主力的相关活动^[18]，本来旨在拒俄的军国民教育会也因展露排满立场而被清王朝封杀。官方对拒俄运动的消极态度可能进一步激发革命热情，进一步影响鲁迅在以拒俄为目的的文本中掺入排满的潜在表述。清末革命家陶成章曾表示，清末革命运动的兴起与清廷在各国侵迫前“不思变计”并“虐遇汉人如故”有关^[19]，所以《斯巴达之魂》中拒俄和反清两种立场的语境纠缠，也和两者共生的历史语境有关。

梁启超在1903年时说：“默察两年来世论之趋向，殆由建国主义，一变而为复仇主义”，并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区别为强调国家主义和反帝立场的“大民族主义”和强调反清革命的“小民族主义”的两股支流^{[20](1069)}，这两股思潮的抗辩和互动造成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在反帝和反清两个面向中“奏响多重”^[21]的现象。《斯巴达之魂》正是两股民族主义思想交汇下的复调产物：鲁迅在拒俄与排满两种话语相交织的复杂语境中，在以前者为主旨的编译创作中添加了与后者有关的复仇话语，使得“大仇斯复”的复仇话语同时具备了指向反帝侵略和反清革命的内外双重指涉，即“从反抗外来侵略到对奴隶国的

抨击，批判锋芒指向国人奴性和异族统治”^[22]。

二、共鸣：近代浙声与斯巴达的精神相遇

浙江一带的地域文化传统在对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探索过程中，与斯巴达在复仇等精神特质上的相遇和对话，可能是影响《斯巴达之魂》文本生成的另一个原因。

邓伟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中，应关注地域文化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关系，强调具体的知识话语的互动与斗争而凸显地域文化建构的意义^[23]，而《浙江潮》等近代地域性文化刊物的文本传播正好可以作为研究的范例。1903年，蒋百里在发刊词中写道：“昔子胥立言：人不用而犹冀人之，闻其声而一悟也。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至今称天下奇观者，浙江潮也。”^[24]如符杰祥所言，其文以作为自然现象的“潮”与胸怀爱国情操的“人”互喻，在“风景的发现”中展示了由独特的地域文化指向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再造^[25]，即以“浙江潮”指代“爱国潮”。这展示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生群体以自身地域的文化、价值传统为基底，对救亡、爱国等时代主题的探索和表达，是一种将地方性知识“推省及国”的文化探索。凤媛指出，以省籍命名的《浙江潮》，虽然在过往的研究中常被指认为是在民族主义思潮涌动的近代时期体现国族主义的范本，但从对当地知识和价值的重视和借鉴中也可以看出著者们尝试从传统与现代，重塑现代江南(浙江)知识分子的努力^[26]。第4期中的《浙风篇》有言：“一地方苟欲于所受隶之国系内，而占一特殊之地位与光荣者，则必先自有一种特立不苟同之一物，而纳于所受隶之国界以量给于国系所隶属之诸分子”^{[13](1)}，即在强调地方独特、优异的文化传统之于整个国家、民族整体的积极意义。浙江恰恰在这一方面占有独特的优势。王嘉良指出，作为宋代以来经济、文化发达的思想重镇，浙江为震荡中的近现代中国知识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精神原动力^[27]，这种文化上后发的开放性促使浙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生群体在近代探

索、传播新思想的进程中走在时代前列，并试图将地方文化价值与时代命题相结合，在求索国民精神的过程中进行表达。从春秋时吴越相争、勾践卧薪尝胆的古事，到明清时从王思任到李慈铭等名士的指认都可确认浙江地方昭然的复仇传统，虽然其未形成体系性的思想范式，但仍作为一种民间的文化心理价值，对当地的风俗文气产生微妙的影响。

鲁迅晚年数次援引“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之说，强调浙地的文化传统对复仇精神的塑造，这种后设的指认可能有“援古喻今”之意，但浙地自古有着“复仇”风俗与刚烈民气也是客观的事实。在晚清内外危局的影响和西学思想传入的熏陶中，复仇传统影响了近代浙江知识分子的政治和文化实践，其既以章太炎等人“排满复仇”的革命思想鲜明地登上历史舞台，也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化价值潜在影响着鲁迅等近代学子对民族国家与国民精神建构的探索。正如符杰祥强调，鲁迅对斯巴达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留学生文化圈及其风气的影响^[9]，对他影响至深的显然也是浙江的留学生圈子。作为革命刊物，《浙江潮》刊发带有反清革命色彩的文章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28]，许多文章不乏民族主义的复仇话语表达。比如，第2期的《叙德、俄、英、法条约所载“高权”及“管辖权”之评论因及〈舟山条约〉之感慨》中，就有“宜鼓舞民气砥砺前途(含有复仇雪耻意)，否则殊非国家将来之佳兆云云”的表述^{[29][33]}；小说《苦英雄逸史》中有“毋忘国仇”的普露士亚皇后路易设^{[29][138]}，第4期的小说《蔡卢藤之爱国》也塑造了感于圣女贞德事迹而“复仇之念刻不能忘，每逢英人恨不能一一手刃之”^{[13][107]}的爱国志士形象；等等。这条潜在的复仇文脉既呼应彼时的革命思潮，也隐约传达浙东一带由刚劲、剽烈民风塑造的“刚性”文化人格，进而指向《斯巴达之魂》的复仇主题。

浙江子弟的刚性文化和复仇传统也可能与希波战争史中作为复仇主体的斯巴达产生共鸣。从近代被译介入华时开始，斯巴达就被时兴的话语建构为彰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的政治实体。刘润涛指出，近代中国报刊中最早提到“斯巴达”的是蔡锷发表于1902年的《军国

民篇》^[22]，文中将斯巴达作为军国民主义之滥觞，由此衍生出对强健、骁勇之“国魂”的呼唤，尤其强调具有强烈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卫国精神，正如文中所引《德国歌》所言：“必仇敌之胥泯兮，而憎恨之全降。”^{[30][34]}梁启超发表于同年的《斯巴达小志》也被认为是《斯巴达之魂》的材源之一，文章亦强调了斯巴达“环其卧榻者，皆仇雠也”^{[20][865]}的仇外传统；这些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对斯巴达进行精神定性的潜在材源，都可能从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对斯巴达的进一步言说。李冬木指出，《斯巴达之魂》是“从梁启超到周树人的精神史过程的到达点”^[31]，鲁迅对“梁式斯巴达”的继承显然不仅在于彰显“国魂”，更在于作为方法通达这一目的的复仇。

鲁迅对复仇渊源的言说不外乎两条主线，一条是始于日后的《摩罗诗力说》，源自拜伦、密茨凯维支等摩罗诗人的“人道复仇”，其更关涉如何从革命和文艺的双重语境中把握一种文学的思想方法；另一条则关乎他“不饶恕”的精神，源自传统和民间地域文化。鲁迅在《杂忆》中提出了关于复仇的经典论断：“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32][236]}与人龃龉时，鲁迅往往将复仇阐释为一种基于文化或地域传统的个体正义，比如“报仇雪恨，《春秋》之义也”^{[17][58]}或是“‘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33]等，这种正义不在乎成文律法，而在乎自发的道德。而革命(无论是抵抗外国侵略还是反对清王朝)也是一种反抗既有秩序的“正义”，源于骨血之中的反抗性格以及对复仇正义的亲近，是鲁迅能够走近斯巴达的原因，也是包括他在内的浙江子弟普遍活跃于清末政治舞台的原因。

除了作为复仇、尚武和爱国等话语的载体，鲁迅最终选择书写“斯巴达之魂”的内在原因，还可能是因为斯巴达曾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探索过程中一度被视为典范。研究者通常忽略的一点是，斯巴达在晚清不仅因其尚武和爱国精神而为人所识，在近代学人眼中，其相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制度更具有显著的优势。《瀛环志略》有言，斯巴达“国势与亚德纳斯(雅典)相将，诸

小国(希腊其他城邦)制度皆效两国所为”^{[10](483)}；《军国民篇》则言：“斯巴达者，欧洲上古史中最强盛之国也。推彼致强之由，则其国法以国民之生命、财产、名誉，均不得不供之国家”^{[30](22)}；《斯巴达小志》中更强调近世立宪君主国“其精神其体例实自斯巴达启之。斯巴达实今日世界十数强国文明国之祖师也”^{[20](865)}。这些论述在今日看来不乏偏颇却将斯巴达树立为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探索过程中的典范形象。《斯巴达之魂》亦受到这种国家话语的影响，比如《记事》中提到的“率丁壮数百”被改写成“将市民三百”，后文也多次使用了“国民”的现代称谓。虽然用语的转换未必符合史实，但却表明了鲁迅以斯巴达作为民族国家建构典范的潜在愿望。

综上，从一个具备复仇传统的城邦到尚武和爱国的国民精神，再到优越的制度和成功反抗外侵略的史实，斯巴达不仅与“报仇雪耻之乡”的浙地神似，更作为一种局部的地域文化影响整体文化体系建构的典范而被近代中国知识界所认识，并与浙地出身的鲁迅产生最初的精神共鸣。鲁迅将文章命名为《斯巴达之魂》，且不拘于历史的实际进展和材源的叙述顺序，跳过了温泉关战役之后由雅典人主导的萨拉米海战这一重要的转折点，重点介绍对于斯巴达具有复仇意义的普拉提亚战役，展现出对斯巴达精神的整体强调。鲁迅以《斯巴达之魂》的复仇之音发文坛初声的意义，不只是缘于既有时局、思潮和文本材源的影响，而也是以复仇这一地域文化的特质为基点，以国族意识导向，以民族革命为目标，包含了被动接受和主动求索的双向文化实践。综上，并不完全是斯巴达和希波战争在诸材源中呈现的复仇话语吸引了彼时受复仇思潮影响的鲁迅，而也是潜在秉持复仇这一地域文化人格的鲁迅对前两者的主动接近。

三、建构：涘烈娜形象与复仇的文学化表达

《斯巴达之魂》有关涘烈娜的情节目前尚未找到对应的材源，一般被认为是鲁迅的原创。樽本照雄站在与《历史》原文及相关史实对照的立

场上，对这部分情节颇有诟病，但又认为涘烈娜这一角色具有中国人的内核。本节无意评价樽本氏对《斯巴达之魂》艺术价值的具体意见，而试图通过辨析涘烈娜形象“中国化”的话语内核发现其对文本复仇话语的推动，明确作为言说主体的鲁迅从作者角度对复仇话语的主观建构。虽然《斯巴达之魂》日后仅被鲁迅视为“尚武”的文本，但“尚武”并不是对勇武的简单推崇，而是经由原创的涘烈娜的情节部分，从个体到集体的复仇得以被推动呈现的。

不妨从解答樽本氏的疑问去理解涘烈娜的形象，他质疑鲁迅并未将涘烈娜处理为一个杀掉懦弱丈夫而彰显尚武精神的形象，而是通过死谏这一行为获得中国性^[8]。首先，《斯巴达之魂》是一部虚实结合的编译创作，虽能有主观虚构的情节，但也不能偏离基本的史实。若按樽本氏的说法处理，情节将与亚里士多德战死在普拉提亚战役的史实存在重大出入。其次，正如上文所说，《斯巴达之魂》是受民族复仇主义话语影响而成文的，其中尤其是鲁迅虚构的这一部分情节，必然更加遵循复仇的书写逻辑。如果涘烈娜行杀夫之事，则无法由亚里士多德将情节引至普拉提亚战役，从而完成从集体到个人的双重复仇。至于死谏的行为，则反映出女性在中国传统复仇文学主题中的形象建构方法。王立指出，中国古代的女性复仇文学主题往往带有鲜明的反文化、反传统意味，即通过否定女性在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柔弱特质凸显其复仇的合理性。同时，女性又需要在复仇中付出比男子更为沉重的代价^{[16](372)}。涘烈娜虽有报国之志，但无法直接上阵杀敌，只能通过死谏的行为将复仇意愿转移到身为逃兵的丈夫亚里士多德身上，推动后者投身普拉提亚战役，从而间接达成复仇目的。

作为鲁迅独创而非《历史》等原文本的固有形象，涘烈娜的形象建构也符合近代思想文化史中的“女国母”形象逐渐向“女丈夫”转变的趋势，反映出在晚清日渐艰深的时局下对复仇话语的同频把握。晚清以来内外交困的局势使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以及救国保种的迫切愿望不断增强，催生出了“女国母”这一类强调生命延续的文化符号。刘堃指出，梁启超在1896年到1899

年对“女学”建构的探讨中，特别强调了女性的母亲身份，认为其延续子嗣的形象是家国结构中女性的合法身份，且国家强弱与女性强弱形成正比，由此建构出了与家国命运同调的“女国母”形象^{[34](84-86)}。所以，在梁氏笔下作为“强国文明国祖师”的斯巴达，其女性形象建构必然符合作者对理想国家的想象，《斯巴达小志》举例的爱国女性也基本以“母亲”的形象出现。

《斯巴达之魂》无疑受到《斯巴达小志》的影响，文章在引出涘烈娜时写道：“惟斯巴达女子能支配男儿，惟斯巴达女子能生男儿。此非黎河尼佗王后格尔歌与夷国女王应答之言”^{[17](13)}，这几乎是对《斯巴达小志》原文的转写，即：“史称有他邦一贵族妇尝语斯巴达王黎阿尼他之后曰：‘惟斯巴达妇人能支配男儿’，后答曰：‘惟斯巴达妇人能生男儿’。”^{[20](870)}除了内容和文字编排的高度相似外，鲁迅从第三人称角度展开的旁述仿佛也暗示着这部分内容源自引述。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鲁迅将梁启超原文的“妇人”改写成“女子”，这个词并不如“妇人”那般特指婚后女性。纵观全文，鲁迅三次以“女丈夫”称呼涘烈娜，可以说是对形象内涵的定调。以往对涘烈娜形象的研究基本围绕晚清文学中女丈夫形象建构的主题展开，论者们也多提及同时期的“女杰”“女英雄”类文本对这一形象的影响^[35]，但很少关注到形象本身的话语嬗变。虽然涘烈娜是一名孕妇，曾在丈夫归来前以“愿生刚勇强毅之丈夫子，为国民有所尽”^{[17](13)}表现出归于国家的母性意识，这也和《斯巴达小志》“故其妇人皆以代一国产育勇壮之国民，为修身大事业”^{[20](870)}的描述类似。但亚里士多德归来后，她非但未表现出对丈夫的爱，反而在责其生还后以有孕之身死谏，这种绝后行为仿佛和“女国母”延续生命的内涵相悖而显得耐人寻味。

从晚清文学的女性形象在近代中国危局逐渐加深的背景中发生的应时变迁来看，涘烈娜正是通过死谏完成了从材源的女国母到鲁迅笔下女丈夫的转变，使之合于《斯巴达之魂》的民族复仇话语。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面前，晚清文学传统中的女国母经由军国民主义等思想的洗礼，逐渐转化成了强调“爱国”和“反抗”的“女

丈夫”。“国母”强调对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延续，而“女丈夫”更侧重反抗、战斗或革命的一面，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且“女丈夫”显然更适于复仇话语的表达。刘堃指出，从女国母到英雌、女国民的话语转换中，包含了将女性作为国民之主体本身谈论的倾向，即以“雄化/去女性化”为代价，将女性话语中有关生育的工具性转移到主体道德与人格的本体性^{[34](144)}，相较于强调女性在婚姻中的依附性形象的“妇人”一词，“女子”更强调其作为与“男子”对立的性别特征，也更接近一个地位独立的人格形象。当然，《斯巴达小志》中的女国母们也具有爱国精神，这可能是由于作者的思想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使得1902年的《斯巴达小志》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过渡性。鲁迅撰写《斯巴达之魂》时大概对“女学”等问题未有深思，但通过借鉴梁氏的文本初步建构涘烈娜的女国母形象，并顺应时代风潮自发地将其转换为一个女丈夫形象的思路背后，仍然呈现出对民族复仇问题的主动把握。《斯巴达之魂》结尾有言：“此涘烈娜之碑也，亦即斯巴达之国。”^{[17](16)}涘烈娜并不是以有孕的“国母”形象，而是以女子之躯承担强烈的反抗和复仇意志，从而超越一众男子被视为斯巴达精神的代表，这即是鲁迅在希波战争故事蓝本的基础上创作涘烈娜形象的文学目的，相比于传统的男性英雄，战争时代的“女丈夫”更能体现出复仇精神在家国危亡之际的炽烈。此外，涘烈娜形象也反映出鲁迅等近代知识分子将斯巴达书写为民族国家理想典范的文化意图。纵观全文，“国民”这个现代观念的表述一共出现八次，且全数借由涘烈娜的想法和语言表达，使之成为传达国民精神探索目标的概念性形象。可见，涘烈娜的精神不仅源于历史上的斯巴达，更归于被鲁迅和近代学人共同想象的斯巴达。

此外，正是涘烈娜形象对情节的串联，贯穿《斯巴达之魂》全文的复仇话语才得以完整。亚里士多德是向波斯复仇的斯巴达人的一份子，其以死雪耻的行为，不仅是对斯巴达“以生为耻”传统的践行，更是对身处拒俄运动与反清革命的留学生界在精神上的强烈鼓动。《历史》以及基于《历史》的相关材源基本只提及亚里士多德返

回希腊后受到的歧视和侮辱，以及后来以战死雪耻的情节，对这一形象的心理转变过程缺乏完整的描写。《斯巴达之魂》通过虚构这段死谏情节，更加完整地表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心理转变过程，并以角色心理作为情节动力，在跳过了具有转折意义的萨拉米海战后直接推进到普拉提亚战役，使全文的复仇精神得以完整传达。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鲁迅对埃烈娜死谏的情节设计，可能包含对自身在家国之变中遭遇的屈辱体认的回应。汪卫东指出，对于传统中国士人来说，家国情感具有一体性^[36]，青年鲁迅受到家庭创伤与晚清中国屈辱变局互相刺激所产生的悲愤与复仇心理，可能影响了《斯巴达之魂》这部分的文本生成。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埃烈娜的死谏是一件羞耻的事，造成这家庭耻辱的原因在于作为逃兵的他使斯巴达蒙羞，是以必须报国雪耻。

如论者指出，晚清以来女杰文化的流行，其“主要还是针对中国男性”^[35]，即通过对雄性、阳刚一面的呼唤寻求反抗、爱国及自强的同调，对埃烈娜形象的认识自然也要回归作者鲁迅本人。《斯巴达之魂》具有“史传”的特色，身为作者的鲁迅在与叙事者同化的过程中也再以史传著者的身份借叙述历史托述自己的思想^[37]。鲁迅在前言中说：“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译者无文，不足模拟其万一。噫，吾辱读者，吾辱斯巴达之魂”^{[17](9)}，在激起读者爱国精神之余，更以“吾”的人称同时成为这一精神的接受者。此际的生者和并未参与实际革命运动的“吾”，实则既是鲁迅类于亚里士多德的自况，是在斯巴达人的复仇精神照耀下的“逃兵”。吴海洋认为，《斯巴达之魂》是“采摭各方史书、材料，并以文章之法对史实进行了重述”，“是对希腊史实的重述与改写，属于史传之文而非作者虚构的自我发挥”^[38]，这种说法更强调基于史实和时代语境的点染发挥。埃烈娜形象的出现加深了文章对复仇精神的表达，但并未改变基本史实，使得亚里士多德的形象转变更显得有迹可循。

丸尾常喜曾论及《斯巴达之魂》的耻感，认为鲁迅从“耻辱”中生发了否定性的动态意识，指出复仇就是从耻辱中恢复的方法^[39]。鲁迅当年

并没有亲身投入拒俄运动的义勇队当中，却可能在拒俄运动被压制后的1904年冬加入了以革命践行复仇意志的光复会，甚至终其一生投身于艰难的思想革命，成为向无物之阵举起投枪的战士，正暗合于亚里士多德以“耻”为行动契机重新出发的心理轨迹。以晚清中国思想文化界以“国家民族的改造”为目标的意义重构现象为背景^[40]，“复仇”在传统文化、传统意义系统的震荡中首先被纳入革命的话语系统。而鲁迅以文艺为媒介，将复仇从革命精神向思想方法的把握，也印证了他在清末建构自身思想体系的过程。如此，通过深入发掘文本复仇话语的根系，才能将《斯巴达之魂》的复仇话语指认为鲁迅文学的激越初声，其在传达与时事、思潮相应的精神主题之余，亦隐含着推动鲁迅日后以更成熟、深刻之姿态表达复仇的内在动力。

四、《斯巴达之魂》的缺席与回归

《斯巴达之魂》长期缺席鲁迅的文本和自我言说。同样是留日时期言说复仇的文本，《摩罗诗力说》于1927年被重录于《坟》，但《斯巴达之魂》直到1935年才被编入《集外集》，且鲁迅自陈之前是“主动删掉”^{[41](7)}。符杰祥曾推测：幻灯片事件后的五篇古文在鲁迅看来思想上更有价值，而应时事而作的《斯巴达之魂》有可能在思想和局势的转变中被鲁迅扬弃^[42]。那么鲁迅对复仇的看法又如何呢？他曾在《杂忆》中说：“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我想，这大半是因为大家已经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药，想给汉人挣一点面子，所以不再有残酷的报复。”^{[32](234)}当年与民族主义思想挂钩的复仇在辛亥革命之后显然也一时失去了适当的表达语境，与“或者因为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须再录”^{[41](7)}的说辞一致。

《坟》的编选和出版时间是1926年末到1927年初，这和鲁迅写作《铸剑》的时间相近。深陷论战与“南下”之难的鲁迅或许更期待进行《铸剑》般个性化的复仇表达，而非《斯巴达之魂》

的民族腔调。与之相关的是鲁迅对民族复仇问题的反思，这可能也是他一度鲜谈《斯巴达之魂》的原因。虽然一度身处革命场域，但鲁迅终于没有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从放弃刺杀，以及日后避免直接谈论光复会的经历等行为来看，鲁迅与民族复仇语境下的一些诸如暗杀、暴动等行为显然有意保持距离，即便加入过革命团体也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内心的自由”^[43]，并可能经由对革命实际手段的反思培养出了立人精神，武装着民族复仇思想的《斯巴达之魂》也可能被他谨慎论及。

那么，《斯巴达之魂》重回鲁迅视野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杨霁云的辑佚功劳，结合文本精神与现实语境来说，文章在上海时期被重编入集，恰是鲁迅以笔为枪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文化斗争的时期，他曾作《为了忘却的纪念》缅怀殉难于国民党反动派之手的柔石等烈士。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正敲响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生存警钟，《斯巴达之魂》激越的复仇精神或许是彼时的鲁迅在悲愤和危机意识中必须重拾的反抗记忆。

此外，从《斯巴达之魂》到《摩罗诗力说》，再到“五四”以来的《复仇》《复仇(其二)》《铸剑》乃至临终前的《女吊》等，从“民族复仇”“人道复仇”，再到自我消解、牺牲乃至“不宽恕”，以及目指向超越的复仇精神，鲁迅对复仇贯穿一生的言说建立在他对概念本身的历时性理解之上。或许，在生命晚年重拾《斯巴达之魂》，也存在给予自我的文学生命，给予“复仇”这个贯穿生命历程和思想轨迹的言说主题以完整记录的良苦用意。《斯巴达之魂》对鲁迅的文艺思想和精神人格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奠基性意义，围绕复仇话语，从材源选取、文化影响和人物形象建构等三个角度探析文本的生成过程，有助于更全面、深刻地理解这篇文章作为鲁迅文学“初声”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中井政喜. 鲁迅探索[M]. 卢茂君, 郑民钦, 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7: 84.
- [2] 邓文初. 民族主义之旗: 革命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兴起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93.
- [3] 格林菲尔德. 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M]. 王春华, 祖国霞, 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0: 1.
- [4] 德拉诺瓦. 民族与民族主义[M]. 郑文彬, 洪晖,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107.
- [5] 祝宏俊, 张俊. “复调”理论视角下的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叙事[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1): 121–132.
- [6] 希罗多德. 《历史》详注修订本: 上[M]. 徐松岩, 译注.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54.
- [7] 希罗多德. 《历史》详注修订本: 下[M]. 徐松岩, 译注.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8] 樽本照雄. 关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J]. 岳新, 赵乐甡, 译. 鲁迅研究月刊, 2001(6): 38–46.
- [9] 符杰祥. 《斯巴达之魂》材源考辨[J]. 东方论坛, 2021(3): 23–30.
- [10] 徐继畲.瀛环志略[M].北京:朝华出版社, 2018.
- [11] 桑原启一. 新编希腊历史[M].东京:经济杂志社, 1893: 147–150.
- [12] 涉江保. 希腊波斯战史[M]. 东京: 博文馆, 1896: 244–245.
- [13] 北京鲁迅博物馆. 《浙江潮》第4期: 影印本[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 [14] 法伊夫, 克赖顿. 《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校注[M]. 艾约瑟, 编译. 陈德正, 韩薛兵, 校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87.
- [15] 郭世佑. 晚清政治革新论[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7: 213.
- [16] 王立. 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 [17] 鲁迅. 斯巴达之魂[M]// 鲁迅全集: 第7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8] 徐学初, 洪鉴, 刘兴全. 从拒俄运动看晚清政府应对民众涉外公共事件之得失——晚清民国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之道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11): 188–194.
- [19] 陶成章. 浙案纪略[M]//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辛亥革命第3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14.
- [20]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 [21] 王晓明. 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J]. 当代作家评论, 2003(2): 4–26.
- [22] 刘润涛. 晚清报刊视野中的《斯巴达之魂》[J]. 新文学评论, 2016(3): 78–83.
- [23] 邓伟. 地域文化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的另一思路[J]. 文艺理论研究, 2006(4): 116–121.
- [24] 北京鲁迅博物馆. 《浙江潮》第1期: 影印本[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1.

- [25] 符杰祥, 李向南. “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J]. 学术月刊, 2022(2): 176–184.
- [26] 凤媛. 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地域文化——兼及对江南文化和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J]. 文艺理论研究, 2011(5): 67–72.
- [27] 王嘉良. 地域人文传统与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建构[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4): 187–203, 208.
- [28] 张玉法. 清季的革命团体[M]. 台北: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5: 17.
- [29] 北京鲁迅博物馆.《浙江潮》第2期: 影印本[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 [30] 蔡锷. 蔡松坡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31] 李冬木. 从“斯巴达”到“斯巴达之魂”——“斯巴达”话语建构中的梁启超与周树人[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2(4): 177–200, 239.
- [32] 鲁迅. 杂忆[M]//鲁迅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33] 鲁迅. 19360210致黄萍荪[M]//鲁迅全集: 第14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4.
- [34] 刘堃. 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再构[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5.
- [35] 李向南. “烈士之毅魄”与“猗欤女丈夫”——论《斯巴达之魂》烈士精神建构[J]. 上海鲁迅研究, 2021(1): 73–89.
- [36] 汪卫东.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话语[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 24.
- [37] 森冈优纪. 明治杂志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M]//森时彦主编.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 袁广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428.
- [38] 吴海洋.《斯巴达之魂》与史传[J]. 东岳论丛, 2024(3): 55–61.
- [39] 丸尾常喜. 耻辱与恢复[M]. 秦弓, 孙丽华, 编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5–9.
- [40] 黄健, 卢姗. 晚清中国思想文化的意义重构与新文学的发生[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158–166.
- [41] 鲁迅.《集外集》序言[M]//鲁迅全集: 第7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42] 符杰祥. 鲁迅早期文章的译/作问题与近代翻译的文学政治——从《斯巴达之魂》“第一篇”疑案说起[J]. 文艺争鸣, 2020(11): 29–38.
- [43] 姜异新. 经历·书写·虚构——鲁迅的辛亥与国民性经验的审美生成[J]. 鲁迅研究月刊, 2013(10): 4–14.

Behind the revenge: A study on the text generation of *The Soul of Sparta*

ZHU Chongke, ZHOU Kaiq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uhai),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00,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revenge as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Lu Xun took the classic “revenge model” of the Greco-Persian War as the motif, focused and highlighted the campaign node colored with national revenge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materials, making the article *The Soul of Sparta* not only echo the Rejecting-Russia Movement, but also imply the intention of political revolution, hence reflecting the phenomenon of the inter-entangling of two types of nationalist thoughts in modern times. The choice of the theme of “Sparta” in the article is related to the spiritual resonance of “Sparta”, which was once regarded as a model of modern national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regional cultural tradition of Zhejia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state. Lu Xun’s construction of the key plot of Si Liena martyred as a remonstration husband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 is related to the common influence of literary trends such as “female national mother” and “female husban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enriches the expression of revenge at the literary level. In addition, *The Soul of Sparta* was not re-compiled until 1935, suggesting Lu Xun’s diachronic search for the spirit of revenge in the past.

Key Words: Lu Xun; *The Soul of Sparta*; revenge; source material

[编辑: 陈一奔]